

白族文化研究丛书

# 大理喜洲文化史考

李正清 / 著

THE HISTORY OF  
XIZHOU CULTURE



云南民族出版社

## 《白族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白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人口有 160 多万，居住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地。大理白族自治州是白族主要聚居区。

白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彩的文化，历来受到世人的关注，古文献中也多有记载。近代，国内外学者对白族文化作过许多考察。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十分关心，对白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国外学者也频频来参与调查研究。

白族文化涵盖广阔，底蕴深厚。当今，社会在进步，科学在发展，认识在深化，更需要众多学者共同努力，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宏伟目标作贡献。鉴于此，大理白族文化研究所在州、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规划推出《白族文化研究丛书》。以此作为热心于白族文化的学者专家发表交流新成果的园地，推进白族文化的学术研究；弘扬白族优秀文化，促进白族文化的发展；进一步让世界了解大理，让大理走向世界。

丛书立足大理，面向世界。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从 1998 年开始，每年计划出版富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不媚俗、有品位的专著和文集。希望热心于白族文化的学者专家、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同心协力完成这一项宏伟的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资助丛书出版的单位和个人名录按先后连续载于每本书之后，以垂青史。

7253/05

## Series Foreword

The Bai are one of the peoples who make up China's great family of nationalities. With a total population of over 1.6 million, they can be found in Yunnan, Guizhou, Hunan, Sichuan and elsewhere, although the vast majority live in the Dali B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The Bai have a lo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e. Ancient records attest that they have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down through the ages.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have undertaken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Bai cultur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e state has been very concerned about minority peoples, encouraging greater depth and breadth in Bai cultural research. Foreign scholars, too, have made many visits to participate in research projects.

Bai culture is profound and complex. Now that society, science and knowledge have advanced, the need is greater than ever for all scholars to work together. Serving as a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y can both carry forward the work of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 and also break new ground, in order to build a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view of this, the Dali Bai 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with the support of prefectural and city administrations, plans to publish the "Bai Cultural Research Seri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searcher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blish their latest findings. Furth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i culture helps the world to get to know Dali and Dali to advance towards the world.

This series has its feet firmly planted in Dali and its face set towards the world. It follows the policy of "letting one hundred flowers bloom, on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Starting in 1998, the intention is each year to publish both specialist books and collected works containing new viewpoints, material and methods. Our sincere hope is that scholars and experts of Bai culture,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unite their efforts to complete this cultural project which straddles the new millenium.

Finally, it needs to be pointed out that any unit or individual who helps support the publishing of this series will have their names recorded for posterity in every successive volume.

# 序

乐 夫

喜洲是云南大理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其历史比较久远；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也一直处于历史的领先地位。因此，古往今来，潜心研究喜洲文化的学者甚多，均有不同建树，引起了若干外国专家的注目，纷至沓来进行考察研究。

然而，也正因为这些学者多系外人，要熟知本地情况实非易事，其中难免有些失之偏颇，在揭示一些文化现象的本质和内涵方面，不容易做到全面与翔实，这已经成为大理喜洲文化研究中的明显缺憾。

李正清先生本喜洲珂里庄回族，从小受到喜洲文化的熏陶，对家乡文化萌发了深挚的感情，迸发出热切的愿望，决心写出一部较为完备的《大理喜洲文化史考》（以下简称《史考》）。为此，他亲自登山访古，深入农户调查，遍阅有关史料，反复验证求是，积累了上千万字资料。后来，虽旅居在昭通工作，仍然于每年寒暑二假回乡深入考察历经30多年，终于在1995年写成了55万字的《史考》，读来慨叹不已，令人敬佩，以下几点尤其感人至深：

一、《史考》以喜洲为焦点，辐射南诏、大理国，纵贯叶榆、史险的全部历史；引证颇丰，考述精当，兼及正史、野史、诸家杂说，尤以重视语言“活化石”之佐证而见长，实为迄今最为完备的喜洲文化史考。

二、《史考》诸多论点均有创见，而先生每摊开一个观点，皆言

之有据，述之成理。如：白族语同古汉语的对比研究，哀牢夷、白国、南诏、大理世系的见解，嵩、昆明、濮、僰、滇楚、爨、白蛮等族的探源等新说都将引起争论。希望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求同存异，以促进喜洲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史考》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突出的地方特点，从而补充和丰富了大理的文化历史，成为汇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的涓涓山溪，其“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是明显的，而在学术价值方面也将展现出广博深邃的蕴含。

《史考》分为地理、历史、经济、民族、世族、家庭、民俗、宗教、诗文、教育、传记等11章，已近似次广义文化的范畴，因而使得狭义文化更为充实与丰满；就民俗学的涵盖而言，各门类相互作用，彼此渗透，不好截然分开，因此这种分章也是新的探索。原稿第12章语言，包含音系、词汇、语法和白族文字与白语系属等节，也有许多创见，而且引用例证十分丰富，只是为了削减书的厚度暂行抽去这10多万字的篇幅，仍有单独成书的价值。

感谢李正清先生为家乡文化建设做了一件丹青永垂的好事。他为弘扬喜洲优秀文化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和重要贡献，家乡人也将永志不忘！

1997年10月10日写于凤城

## 说 明

一、本书称为《大理喜洲文化史考》。

二、书中拉丁字母音节为拼音白文（以大理市喜洲镇白语语音为标准音），带调值者则为国际音标。

三、本书研究的对象为喜洲。喜洲一名有行政区域名称和文化区域名称两重含义。作为行政区域所指即大理市下辖的喜洲镇。该镇汉晋时期为益州郡叶榆县治所在地，辖有今大理、洱源、宾川等地，幅员甚广。南朝诸代则分属东河阳郡或西河阳郡。隋、唐迄于宋，称为史城或大厘城，为南诏、大理两朝的京畿重镇（南诏时两度作为国都），所辖介于今邓川、大理两地之间。元初，一度设喜洲县，旋并入大理路。明代称宏圭乡，清代称上乡下半铺，均属太和县。民国时期，改太和县为大理县，在喜洲设史城镇，抗日战争后改称五台镇。以上是喜洲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历史沿革。本书所指不单止此。

喜洲的另一重含义是以喜洲为中心的直接影响的范围。这就是说，我们所记述和研究的喜洲除了今喜洲镇外，还包括周城、湾桥两个乡镇。

周城位于喜洲之北，是古代河蛮自固的城邑之一，唐初曾在这里设置过神泉县、龙亭县。以后隶属史城。明代属宏圭乡。清代属太和县上乡上半铺，民国改称云沧乡。今为喜洲镇一办事处。

湾桥位于喜洲之南，唐、宋隶属史城，明代称保和乡，清代称太和县中乡上半铺，民国改称桂楼乡。

喜洲、周城、湾桥 3 个乡镇，行政设置上远密近疏，有合有分。大体上，周城与喜洲合多分少，湾桥与喜洲则是分多合少。3 个乡镇古今行政设置虽不全统一，但由于都位于大理平原的北端，山水相连，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亚文化区域。本书所记述和研究的喜洲就是这个文化意义上的喜洲。

四、本书研究的范围为喜洲地区的文化。什么是文化？从广义方面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指精神财富，也就是精神文明，或者说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以此为准则，我们将喜洲文化按照可叙述面，分为地理、历史、经济、民族、世族、家庭、风俗、宗教、诗文、教育、人物等 11 个部分，前三部分属于“志”的范围；后八个部分属于“史志”的范围，都以历史为线索，分别叙述考察各种文化现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相互联结的历史轨迹。

五、本书断代始于公元前 339 年（庄蹻入滇），止于 1949 年 12 月 9 日（云南和平解放），历 2288 年。具体各章则参差不齐，如历史章，因材料缺乏，民国年间除罗树昌“保安军”入喜洲一节外，余都暂付阙，以俟来哲。

六、喜洲或喜洲地区自来无志，省、府、县诸志有关喜洲情况都略于记载。直至本世纪 90 年代初，方有笔者本乡先辈杨宪典先生《喜洲志》之作，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然因系属首创之工作，且局限于喜洲十六村一隅，故许多可用的材料都未能用上。本书从体例上跳出了“志”的范围，对象扩及整个喜洲文化区，因此各方各面的材料征用不少。所征用材料或明引或暗引，都说明其出处与来源，以昭信实，可供研究之用。

七、本书第一章为地理。叙述喜洲文化区的疆界、山川、气候、特产、村邑、景观、古城、古墓、楼阁、民宅、甸疆、交通



等 12 方面的内容。这些自然现象都不同程度地烙印着文化的痕迹，而且是文化得以产生发展的环境。旧志中，景观、楼阁属名胜，古城、古墓属古迹，特产、交通属经济；新志则村邑属地名志，颇多交叉，今统为一篇。

八、本书第二章为历史。以编年的形式叙述有关喜洲开发方面的大事。分战国、西汉、东汉、蜀汉、隋、唐（南诏）、后晋、宋（大理）、元朝、明朝、清朝、民国等 12 个阶段。

喜洲最早为叶榆县治所，而叶榆又是滇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喜洲与历代王朝有着较多联系。此外，喜洲又是哀牢旧地、白国故里及南诏、大理、大中国 3 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皇族的家乡。因此，在历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九、本书第三章为经济。叙述研究喜洲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及社会生产、生活及阶级状况，以说明喜洲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喜洲的社会经济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农村公社社会、封建社会 3 种形态。

原始社会即古代社会。当时喜洲人一般都是同一血统或同一部落，分别在点苍山麓半穴居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外兼采集、渔猎），过着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已知的新石器遗址有 12 个（见《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但只发掘了一个“白云遗址”。因此，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我们还知之不多。

农村公社是由古代原始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摒弃了血缘纽带，由不同血统，来自各方的居民组成，实行土地“公有私耕”的制度，居民之间有贫富差别，但阶级分化还不很明显。晋代至隋、唐，由于中原王朝在边疆的统治势力削弱，而地方上的河蛮大姓中又未出现较强大的统一力量，遂使农村公社得以发展并延续较长的时间。农村公社制度在喜洲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

公元八世纪初，南诏建国，喜洲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奴隶社会形态基础上进入封建社会，直到1949年，经历了1100多年的时间。

喜洲的封建社会分为前、中、后3个阶段。前期即唐、宋（南诏、大理）时期，这时期的特点是农村公社解体，皇族（贵族）、世族（官僚）地主阶级兴起，社会上分离出自由民和被剥削、被奴役的农奴阶级。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生活日新月异，日趋繁荣。中期即元、明时期，这时期，原来农村公社的残余及一些奴隶社会的因素遭到涤荡，蒙氏、段氏、高氏的领主势力及世族地主势力分别遭受到打击，庶族地主阶级悄然兴起，文化发展的程度等同于中州。而农民的生活则日益贫困。后期即清朝、民国时期，这时期，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民阶级纷纷破产，农业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手工业和商业得到飞跃发展，商业资本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代工业萌芽，现代教育得到较好较快的发展。

十、本书第四章为民族。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以此为标准，对喜洲的居民进行分析可知，喜洲有白族、回族两个民族。

白族在其形成过程中既有土著成分，也有外来成分。

土著成分即《史记》、《汉书》所说的“僑昆明”。经考证，“僑”为“布旧”之误。布旧即“白人区域”的意思。这个群体较早地出现在大理的历史上，我们对它之前的来源、演变、发展等还知之不多。揆之白语“布旧”的音义，以这个群体为白族古代土著的先民是没有多大争论的。

白族的外来成分，按历史顺序则分别有濮、夔、滇、楚、爨、白蛮等，他们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融入白族之中。

濮，是白族中最早的外来成分。濮为华夏民族，颛顼时代，

居于宋、卫之野，以濮阳城为中心的濮水流域，是名副其实的“帝高阳之苗裔”。夏代亡国后，受商人的压力逐步向西南转移，先定居于江汉之间，与诸周姬之国为邻，成为周的盟友。公元前822年（楚熊霜六年）起，受到楚人“启濮”的压力，达三世纪之久。公元前509年（楚昭王七年），楚人灭尽江、汉诸姬，迫使濮人又一次向西迁移，到达岷江、金沙江、朱提江三江交汇的大三角地带，被称为夔，建立过夔侯国。秦汉前后，因“汉人多，渐徙斥之”，被迫迁进滇中，称为滇。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楚将庄蹻率众进入滇池，融合于滇、夔之中，历史上，这个共同体建立过滇国；后迁都白崖，称白子国。汉武之世，帝嘉仁果为众所推，以“玉印册之，为滇王”。复经三四百年，演变为西爨白蛮。

公元748年，南诏蒙氏建国后，西并白国，东灭西爨，将西爨白蛮二十万众迁到滇西，为南诏的发展和白族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值得指出的是，相传的白国国王张氏及南诏蒙氏、大理段氏、大中国高氏都是喜洲人，由此可以看到喜洲在白族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族的自称和它称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土著成分称“布旧昆明”。外来成分，三代时期称濮、百濮，这些名称属自称，无褒贬色彩。从战国末迄汉，称夔，有贬义，属他称。而滇以湖泊得名，无贬义，属自称。魏、晋已降，称“白蛮”、“河蛮”，有贬义，属它称。唐中叶至宋初有八国、八族的称谓，这是“白”这个音的一音之转，为主客两方面都能接受的中性词。白王、白国这些称谓的出现，标志着白族这个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大理国时期）。

回族为喜洲人数较少的族群，来自西域，元代进入大理，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

十一、本书第五章为“世族”。世族来自古代氏族，而哀牢

九隆则是至今我们所知道的喜洲地区唯一的氏族。因此本章开宗明义，对哀牢九隆（包括南诏蒙氏）与喜洲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世族或称“大姓”，或称“名家”。据史书记载，唐宋（南诏、大理）之际，喜洲文化区内有杨、李、赵、董等10多个大姓，《元史·地理志》载有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等13姓。这些大姓在农村公社时期“自固洱河城邑”，其头面人物被称为“酋帅”、“首领”、“大首领”，有人朝受官秩者则称“县令”。喜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就操在这些人手，喜洲文化不论是雅文化还是俗文化都与这些人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随着白国、南诏国、大理国、大中国等地方王朝的建立，蒙、段、高等的家族理所当然地成为贵族，其他大姓也在政治上取得特权，成为世袭的世族。又随着南诏等地方王朝的覆灭，贵族或被消灭或降为世族，世族在沧海桑田的变化中又不断沦为庶族或庶民。最后形成近百年来的杨、赵、尹、段、董、张、严、高、王、黑、何、钊等宗族。

十二、本书第六章为家庭。通过对有关文化形态积淀的分析和对语言词汇的研究，可以看到，喜洲地区的家庭形态是发育得比较完善的。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础细胞，“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恩格斯引摩尔根语）。历史上，喜洲地区曾经产生过母权制和父权制两种社会制度，与这两种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婚姻制度，在母权制下，有群婚、血缘婚、对偶婚等婚姻形式和制度；在父权制下，则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家庭即是以种种不同形式的婚姻制度构成的血缘单位或社会单位。古代喜洲，原始社会解体，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由于受到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往往是几代人同居，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称为大家庭。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家庭愈来愈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因素产生以后，大家庭遂走向解体，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大家庭的崩溃对深受封

建文化影响的喜洲曾产生极大的影响。

十三、本书第七章为民俗。民俗即民间的风尚习俗。按语义，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俗”，但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一般说来，习俗是文化特征中最能表现一个社会群体的心理素质的最主要的部分，从广义的方面说，举凡宗教、语言、文艺、歌谣、婚姻、丧葬、服饰、饮食、禁忌、节日等无一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化与习俗是同义语。

婚姻和丧葬与家庭关系较密，已放在家庭一章中研究，语言和宗教也分别列章，故本章只研究服饰、饮食、禁忌、节日等内容。

十四、本书第八章为宗教。自古及今，喜洲地区曾经出现过巫教、本主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6种宗教信仰。巫教和本主信仰是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则是外来宗教。从信仰的民族说，白族信仰巫教、本主教、佛教、道教，少数人信仰基督教，而回族则全民信仰伊斯兰教。

巫教是原始宗教，它崇拜大自然与大自然力，有天、地、日、月、山、川、石、树等神灵，人们都以自身的形象赋予诸神以人的形象，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宗教。从神灵的属性中可以看到喜洲地区的巫教深受中原和楚国两地的影响，这与白族的族源中有濮、楚和楚人的文化因素有关。

喜洲是白族本主信仰的发祥地。本主信仰是地方农村公社的宗教，它与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不同，它来自巫教，但是它的神灵与图腾崇拜也不同，本主教的神灵多半是英雄豪杰、忠臣义士、功臣良将、贤男德女，是作为一个地方（自然的最小的行政区划）的保护神出现的。根据文献，它产生于南诏时期，到了后理国时期，段氏将其远祖段宗榜封为五百神王中央爱民皇帝以

后，即开始向人为的宗教过渡，从而产生了神的系统和封号，并产生了娱神的节日。但是由于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制约，它没有经典，没有戒律和种种繁琐的仪式，也没有神权的世俗代理人——教主，更没有给白民一把启开天国之门的钥匙，给苦难的众生指出一条解脱的康庄大道，保护白民生产生活的安全和安定，几乎就是它唯一的神职。唯其如此，所以也使许多研究者倾倒，他们认为本主信仰“富有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本主信仰给人民思想意识上一种慰安和鼓舞”，进而得出“这种信仰与宗教迷信是不同的，应该充分肯定”的结论（《白族文学史》（初稿））。因本主信仰是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宗教，从而才让人们产生以上种种误解。为了让读者能系统、全面、准确地理解本主信仰，我们在叙述该信仰如何形成的基础上详尽介绍喜洲本主信仰的神系及它们的封号和行状。

佛教是唐代由西藏和中原分别传到喜洲的外来宗教。传统称之为密教、密宗等，因传法的僧侣称为阿吒力，所以也称阿吒力教。这一个教派在教理上已抛弃了佛教显宗各派的义理探讨和禅定思维，不遗余力地宣扬“心向往之，即身是佛”的佛理，讲究以口、身、意三者为主的三密加持功德，建“五密坛场”，举行盛大的灌顶典礼，设帐授徒，传授各种繁琐的仪礼，甚至呼风唤雨，捉龙驱鬼，造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宗教运动，同时又吸收了巫、道两教僧众的法术性活动，使密教取得了兼容并包的优势。最后在南诏、大理等历代国王的支持下，形成了与本主信仰、巫教、道教鼎足而立的局面。

佛教在喜洲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仅佛寺一项，据目前所知就有 20 多座，“伽兰殿阁三千堂，兰若宫室八百谷”（《山花碑》），“叶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鸣钟”（张含诗）的诗句，记录了这种盛况。此外，喜洲地区的佛教自唐代迄元明，还培育出一大批高僧、大阿吒力、居士，文献可考的就有 40 多人。而且到了

1949年，群众性的宗教组织——拜佛会几乎普及每个自然村。上述种种充分说明佛教在喜洲地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喜洲地区的道教直接来自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又称为天师道。崇信天、地、水三官，主持宗教的道士称为“高姑”，《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称之为“各群”。道教接近于原始巫教，所以在南诏初期曾一度风行，后因南诏崇拜佛教，遂有灭道教之举，但在喜洲地区还占有一席之地；有紫云山（斗姆阁）、德义院、三官庙、王皇阁等十来个道观；信仰者多半为中老年男性，每在道会期间，他们聚于道观举行朝斗、扶乩等宗教仪式，奏洞经音乐，十分隆重。火居的道士（各姑）多半替人送葬，超度亡魂，遇地方上出现水、旱、疫等灾则有义务进行祈雨、驱鬼、除灾等宗教活动。

喜洲白族对巫、佛、道三家同样看待不分轩輊。也许基于这种态度，巫佛道三家也主动调整相互的关系，如大黑天神既是佛家的护法神，同时也是本主教的本主；而中央皇帝既是本主教的本主，又是道家神坛上的监察神，等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合流趋势。

元代进入喜洲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村落共有9个，清朝咸同年间以后还剩5个（珂里庄、上兴庄、峨良哨、美坝村、喜洲）。该宗教名称的意义为和平、清真，信徒们非常讲究睦邻关系，不主张在清真寺之外和非伊斯兰的群众中布道，因而能保证自身的正常发展。七百年来，信仰伊斯兰教的村邑未增加一个，表现出较强的自律性。

抗日战争期间，武昌华中大学西迁喜洲，学校师生中有大批基督教信徒，曾试图在社会上传播，在喜洲市上街为少数白民进行过洗礼。抗战结束，学校迁回武汉，少数信徒也就不再举行集体的宗教仪式。

十五、本书第九章为诗文，即诗歌、散文。散文分为3个部

分：一为公文，包括制书、奏书、战书等，这些材料是研究喜洲的政治地位以及与中原的历史关系的重要资料，择要附录于“历史”一章。二为碑文，多数是元明两代在宏圭山、莲花山两地的墓铭碑刻，是研究喜洲乃至整个白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三为艺文，多为学者的序跋、专著，是研究喜洲地区学术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本来，喜洲地区的文献资料尚不止这些，但有的已经散失，有的囿于见闻为笔者所漏。全面的搜集整理尚有待于来者。

诗歌是文艺，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以形象思维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化形态。有谣谚、汉语诗词、山花体诗歌等。

谣谚是短小精悍的口头创作，多用白语，翻译成汉语的不多。见诸于文献的有东汉时期的《行人歌》及其他时代的共5首，数量极少，尤觉可贵。

喜洲的汉语诗词，从唐朝开始，历代都有，其数量、质量都非常可观，从这部分诗词中，可看到喜洲的汉文化水平。

“山花体”是最有白族特点的文艺形式，历史悠久，在民间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章对其特色作了较详尽的考述。

喜洲还有丰富多采的民间故事与神话，本章选录几节，供参考。

十六、本书第十章为教育。喜洲地区丰富多采的文化得以传播和传承，与喜洲文化自古以来重视教育、尊师重道有着重要关系。从白语称老师为“宗师”中，可看到教育在喜洲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从现代意义上来看待喜洲的教育，可以说在清代以前，喜洲的教育与广大汉族地区一样，属于传统教育（从内容与形式与汉族地区没有质的区别）。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现代教育。1938年后，五台中学建立，不久华中大学又迁到喜洲，从而使喜洲的教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由于材料所限，喜洲地区的教育状况，不论古代或现代，所



述并不充分。笔者企待有识之士给予补充。

十七、本书第十一章为传记。喜洲历史人物是喜洲经济和文化的产物，经搜寻、筛选，共得 103 人，材料或来源于文献，或来源于碑碣，或据民间传闻，都有所本。所列传记的人物，多属于社会上层，有帝王将相、贵族世家、名流、隐士等等，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影响过喜洲地区社会的发展，是研究喜洲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民国时期，喜洲地区出现了大批工商界人士，如严子珍、严燮成、董澄农、董仁民等，在云南工商界颇有声望。另外，他们也曾为喜洲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他们的事业在“经济”一章中作叙述，不在本章列传。

张耀曾先生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辈，周保中同志则是抗日英雄、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与光辉业绩曾鼓舞着一代代的喜洲地区的子弟，成为喜洲人民崇敬的楷模。他们所留下的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最后谈语言问题。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不止如此，人类还通过它创造了文化，将一个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历史和世界观记录着并且传承下去，从而使语言成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白语的系属问题在语言学界还没有一个趋于一致的结论。可以预料，这将是继续争鸣下去的一个问题。因此，对白语喜洲话必须另文作详尽介绍，在本书中暂从略。